

《开端》何以热播？ 珍视那些降落在平凡人身上的能量

苏展

《开端》成为2022年首个爆款剧，开播就冲上8.2，评分人数超过20万。全剧只有15集，讲述男女主角遭遇公交车爆炸，不断进入时间循环反复遇险后，抽丝剥茧，找出真凶，试图拯救全车乘客的故事，叙事严谨，层层递进，仅第一集就发生了六次时间循环。

然而，说清楚《开端》是什么剧，仿佛并不容易，我们无法将其归纳于以往观众所熟知的类型。它脱胎于网络小说，想象充沛、包罗万象的“无限流”题材几乎首次被中国观众看到并接受。同时，剧情和人物的动机又十分符合真实生活的情况和逻辑，乘客大老行李箱中装着给女儿的“散装卫生巾”，二次元少年母亲令人窒息的爱，都回应着社会热点话题，展现了时代关切。剧中设定和情节不仅是对现实世界人与物的各方面逼真模仿、还原，而且每个人物的遭遇、情感的生发、情与理的挣扎都真切地出现在观众的现实生活中。因此，分析该剧为什么能够成为爆款，或许应该从它如何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情、契合了大众的情感结构入手。

生活解题： 条件与选择

总体而言，《开端》的叙事始终围绕一个“选择”的问题，或者说，在创作者眼中，在喜爱《开端》的观众心中，生活本身就时刻围绕“选择”展开。

两个陷入循环的主角李诗情和肖鹤云所争论的问题，不得不作出的艰难选择，都是观众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比如，肖鹤云问李诗情，他们不是凶手，有没有必要为了一车人牺牲自己，这是个人与群体、个人命运与公众利益的问题。再如，尽管肖鹤云认为二人逃离险境就好，无需当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是，促使他继续行动的动机是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你（李诗情）一副赴死的模样”，这是生存与情感的选择。面对选择，有人坚定决绝，义无反顾，但是迟疑也会获得理解和包容，正如李诗情问肖鹤云的那样：“如果循环一直提前，我一定还会在大学城站上车。可是

你呢？”做选择的驱动力可以是生命、是利益，也可以是价值实现和责任感，正像他们选中的“队友”、二次元少年卢笛那样，是因为“这是我二十三年来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可替代”。观众对剧集的好评和喜爱，正说明，这些问题也是观众自身正在面对和思考的，观众能够体会主人公的处境并认同他们的选择。

叙事如同解数学题一样展开，这是《开端》的叙事尤为新颖之处。每次进入“循环”，主人公都掌握了更多的条件：完成任务的时间多了一分钟，同时也获取了更多信息。进入循环的实质是进入了另一重情境，因此，循环其实是向观众展示了不同生活情境下，如何做选择、如何权衡利弊的问题。权衡利弊不是一分为二地比较，是置身于生活的复杂性中的权衡，条件相互制衡，受正义的价值信仰引导，权衡利弊的人——包括主人公与观众自己——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人，能够抽丝剥茧、制定策略。在多重因素的编织中，循环、选择变成了如同做数学题一样的层层推理，或许距离结局和真理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通过信仰、价值、知识、经验的逐步加成，通过情感的浸润实现自身的成长，主人公和观众终将拨云见雾、解开谜团。

告别“悲情”的“英雄”

在一次次循环中，主人公了解更多情况，掌握更多知识，这也让他们更有能力施展谋略，更有底气和获胜的把握。这样的模式似乎在文学范畴里的成长小说中十分常见。但是，相比于传统的小说叙事，《开端》中主人公的知识积累、心智增长似乎更为有迹可循。每次循环后的主人公都更强大也更接近真相，更接近达成拯救全体乘客的目标，这与网络游戏的机制高度相似。在文化工业充分发展、高度成熟的当下，扁平化叙事成为网络游戏与网络小说的惯用写法。跳出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主人公通过加载技能，在既定的清晰程序下升级打怪，游戏玩家、网络小说读者，以及观看采用这种叙事模式的影视剧的



白敬亭在《开端》中饰演
游戏架构师肖鹤云



赵今麦在《开端》中饰演
在校大学生李诗情

观众们都能达到“爽感”，获得审美愉悦。

在这样的创作逻辑下，《开端》令观众欣喜的是，尽管两位主人公在爆炸中反复牺牲，“英雄”的底色却不再是“悲情”的了。这无疑展现出了强大的鼓舞力量。在既往的文艺作品中，观众所熟悉的英雄往往要走向“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预设整体的保全和个体的完整是不能两全的、有冲突的，由此达到悲剧的审美效果。相对而言，二次元爱猫少年卢笛加入任务的初衷是“拯救世界”，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的英雄动机。然而，与美国式的“英雄”电影也不相同，《开端》中表现了更多的推理细节，细致展示

了三个少年如何权衡条件，由此进行全面的价值观传输，并不是集中在简单的、不计后果的“勇气”方面。换言之，情感的张力不在英雄闯关的情绪渲染上，而是寓于大胆谨慎地对困难和问题各个击破的过程中。无论是情绪稳定的李诗情，还是因为“看上去有能力”而被选中的卢笛，这样的新英雄设定也是当下站在新的经济和国家发展阶段的应运而生。新英雄是自信、强大且技能满满的普通人。

规则与道德、生存与正义、逻辑和情感，如何取舍、如何权衡，不仅是少年“英雄”不断回答又推翻重来的难题，更是观

众在生活中时刻要面对的拷问。《开端》的热播不仅反映了观众对其叙事严谨、制作精良的肯定，更说明了其中价值传递的有效性。这并不是孤立的。当下引发热议的大众文化形式和作品，如“脱口秀”、“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其核心亦并非语言艺术，而是强价值观输出。其内容表达契合大众文化的主流消费者——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价值和情感诉求，其中既有他们面对重复劳动的无可奈何，也有他们掌握一定知识，怀有热情，有价值建构的冲动。二者的张力则凝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开端》的背景设定在2019年，那个

时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还没有发生。然而，虽然它不设定在疫情背景，却在当下被广泛接受，它的流行无疑准确观照了疫情背景下的社会现实：面对的情况复杂、误解重重，可能有时无法自证，但依然坚定努力，小心求证。尽管艰辛曲折，结果终将指向现实问题的解决和正义价值的实现，抗疫的现实也似乎如此。人是有能力的人，不再是大事中不知所措的个体。观众所珍视的，正是这种降落在《开端》中平凡人身上的建构能量。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讲师）

期待更多有力的小人物形象重回喜剧电影

——评电影《东北虎》的创新和缺失

桂琳

正在上映的电影《东北虎》，其实跟东北虎没什么关系，而是一群失意者的故事。片名更多像一种隐喻，既表明这个荒诞喜剧的发生地，也指向片中主人公的精神困境。

重视小人物塑造是中国喜剧电影的优良传统，有效地塑造小人物形象也成为喜剧创作的重要命题。然而，目前以宁浩式喜剧和开心麻花式喜剧为代表的两个主流商业喜剧阵营，在这方面都陷入了危机。《东北虎》的出现，正是为当代喜剧电影如何塑造小人物带来了一定的启示和讨论空间。

以荒诞喜剧进行小人物塑造的一种可能尝试

《东北虎》整体偏向于荒诞喜剧，这也是该片导演耿军所擅长的个人风格。研究者界定荒诞喜剧“是一种夸张而深刻的、具有哲理内涵的严肃喜剧片”，一方面智慧含量高，创作难度大，对创作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创新的可能，因为荒诞喜剧能够帮助创作者超越现实生活表象，进入到生活真相和人性深层展开探索。如果创作者的能力超群，有可能产生高口碑佳作，甚至影史经典，如《奇爱博士》《楚门的世界》《冰血暴》等。

《东北虎》采用荒诞喜剧的形式，试图对小人物的灵魂世界进行挖掘和探索，甚至尝试触碰中国当代社会的一种整体性精神困境，是很有勇气的。《东北虎》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它也并不属于完全的荒诞喜剧。因为荒诞喜剧容易呈现出一种超现实和象征性的美学特征，真实的画面面貌反而有可能在其中无法展现。而且荒诞喜剧更是有着一种绝望的情绪，给人毫无希望的感觉。中国影坛产生过一些这样的作品，如管虎的《斗牛》《杀生》、姜文的《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黄渤的《一出好戏》、陈建斌的《一个勺子》等。《东北虎》则在尽力避免荒诞喜剧所携带的超现实感，着力挖



章宇在《东北虎》中饰演徐东

掘一种真实的社会状态，并以现实与理想的力量去对抗荒诞喜剧的绝望情绪，为观者带来某种希望。

为了实现以上可能，《东北虎》进行了多种艺术尝试。在妻子出轨的丈夫和情人、亲戚间因为生意失败的钱财纠纷等十分狗血与不堪的凡俗生活构成的情节主线中，导演有意将一些充满诗意和理想的人物如小二、诗人等插入其中。这种强烈的反差既产生荒诞感，又是试图摆脱荒诞感的努力。还有故意让身份低下的人物在进行卑贱行为时使用充满哲理的深奥话语，也是在制造荒诞感的同时，又试图唤醒观众的理性思考去对抗荒诞感。在影像呈现上，影片也一边以记录风格将最为具体的残破环境影像进行写实呈现，一边又以抒情风格展现其中的美感和浪漫。这一系列的并置处理，使电影传达出来的情绪也是复杂的，有绝望和无奈，也有对故乡充满

情感的凝视和留恋，更有着创作者对小人物的悲悯同情。

《东北虎》的这些努力其实为中国当代喜剧电影的小人物塑造带来很多新鲜的思路，触及当前喜剧电影创作中塑造小人物的多种可能途径。比如如何避免将小人物呈现为抽象的符号和景观？如何刻画小人物的精神气质？如何让小人物塑造不陷入完全的荒诞感？如何在小人物塑造中追求诗意和美感？如何在苦难叙事中寻找光明？等等。

为什么没有做到叫好又叫座

《东北虎》是耿军初次执导的院线商业电影，作为一直拍摄小众艺术电影的导演，他既没有太多的商业电影执导经验，也没有

建立起商业电影意识，尤其是没有处理好作者风格和商业电影的结合。这导致影片创作意识虽好，其中也有很多充满智慧的片段闪现，但最终没能形成一部有机统一的电影作品，产生叫好又叫座的效果。

电影采取的仍然是导演本人所习惯的艺术电影的情节和人物思路。不仅几条线索之间没能建立起有机联系，而且每一条线索都十分松散，出现大量的情节空白，导致观众没有办法沉浸到电影情节之中。男主角徐东则是艺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类被动型人物，缺乏明确的意愿与动机，只是从一个情境滑向另一个情境。妻子的形象就更是模糊，他们的夫妻关系到底怎样？丈夫为什么多次出轨？这样的疑问在影片中完全没有给出答案。这种毫无动机和目标、道德面貌也十分曖昧的人物形象，不仅没有办法让观众共情，反而增加了观众对影片的同离感，可以说是犯了商业电

影的大忌。

因为人物形象的不鲜明，也使得演员的表演特色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无论是章宇在《无名之辈》还是马丽在《夏洛特烦恼》中，都曾贡献过相当出色的喜剧表演和小人物形象塑造，并凭借这两部喜剧电影在观众心目中建立起喜剧形象期待。但导演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明星特质，这使得两位明星不仅没有发挥空间，反而成为影片中的异质性元素，与片中其他来自导演原班人马的演员之间没能形成很好的表演互动。也因此，在表演层面上，加入喜剧明星的《东北虎》反而不如导演原班人马此前的《轻松+愉快》那么浑然一体和风格鲜明。

前文提到，导演有意识将一些象征性元素插入主情节，如东北虎、诗歌、哲学、小二的风筝和梯子等，但它们都是做作地悬浮在电影中，并没有与影片内容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也说明以荒诞喜剧形式展开小人物的精神探索，同时又要避免荒诞喜剧的超现实感与绝望情绪，在创作上是相当有难度的，导演本身也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尝试。

喜剧电影中的小人物塑造危机

之所以愿意花费笔墨来探讨《东北虎》的得失，是因为电影市场上目前比较成功的两大商业喜剧阵营——以开心麻花喜剧为代表的杂糅拼凑型喜剧，和以宁浩式喜剧为代表的情节主导型喜剧，近年来都在小人物塑造上陷入了危机。

开心麻花喜剧一直不重视情节完整和人物形象塑造。情节段落之间没有密切的逻辑关系，而是几个相对独立的片段，靠牵强的巧合和随意的拼凑组合在一起，倚重的是每个片段中笑点的分布和演员的喜剧表演。这类喜剧创作质量良莠不齐，出现过如《夏洛特烦恼》《半个喜剧》等比较优秀的作品，但粗制滥造之作还是占有相当分量，近年来质量更是每况愈下，情节设计粗陋和人物塑造虚假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只能通过大量恶作剧等笑点来刺激观众的感官。可以说这种主要靠各种笑料和段子堆积的喜剧电影，从先天上就无力刻画有力的小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现实真相。

以宁浩式喜剧为代表的喜剧主导型喜剧，通常采取将喜剧与另外的成熟类型组合的方法，重视笑点与情节的结合，情节结构相对严谨，也十分强调人物形象的塑造，喜剧质量能得到相当的保障，这也使得其在小人物塑造上有一定的优势。《疯狂的石头》《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等一些代表作，就塑造了不少与时代命题紧密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小人物形象。但伴随着其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创新动力越来越匮乏，也日益缺乏真实生活质感，2019年的《受益人》就集中暴露了这一类喜剧的诸多问题。一是底层环境在电影中被高度景观化。肮脏的街道、破败的房屋、霓虹灯和广告牌，鳞次栉比的小吃店等环境影像被多次重复使用，实际已经变成一种抽象的底层景观，对真实的社会面貌反而进行了遮蔽。二是小人物形象失去接地感。《受益人》中不顾生活真实地夸张主人公吴海海的苦难，导致其苦难缺乏可信度。更严重的是，吴海海的道德面目也比较模糊，价值更是出现问题。三是为了实现娱乐功能加入过多的后现代戏谑元素，使其中的小人物塑造显得油滑与肤浅，无法处理更严肃和重大的时代问题。

可以说，中国当代商业喜剧电影在小人物塑造上迫切需要一些新鲜创意带来的活力。而从中国电影健康发展来看，像耿军这样鲜明的个人印记并致力于思想和艺术探索的作者导演，对商业电影发展是很珍贵的资源，并带有很多的创新发展。《东北虎》虽然不能算叫好又叫座的案例，但它的拍摄和上映也让我们看到一种希望，如果作者导演和商业电影之间能够形成某种良性互动，也许能够让更多有力的小人物形象重回我们的喜剧电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